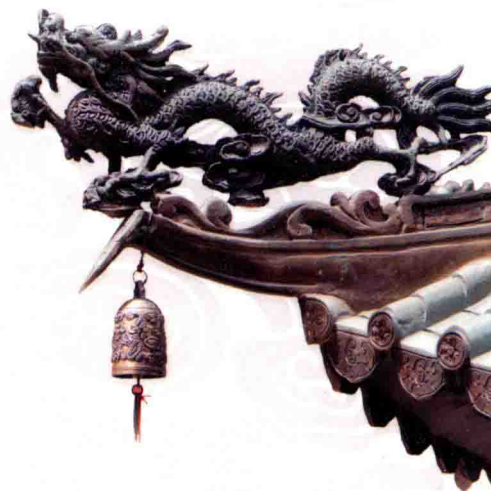


赵永春等◎著

中国古代 东北民族的 「中国」 认同

Zhongguo Gudai

Dongbei Minzu De "Zhongguo" Rentong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前期研究成果
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项目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赵永春等◎著

中国古代
东北民族的
「中国」认同



Zhongguo Gudai

igbei Minzu De "Zhongguo" Rentong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 / 赵永春等著.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1

ISBN 978 - 7 - 207 - 10669 - 8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历史—
研究—东北地区—古代 IV. ①K2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5103 号

责任编辑:姚虹云

封面设计:周磊

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

赵永春等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页 2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669 - 8

定 价 5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82308054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前期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ZDB027）
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项目（项目编号CBZZ1503）



目 录

绪 论	(1)
一 “中国”认同概念的界定	(1)
二 本课题研究意义	(11)
三 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13)
四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思路	(17)
五 主要创新之处	(21)
第一章 慕容鲜卑及其政权的“中国”认同	(24)
一 慕容鲜卑自称“中国”	(24)
二 对中国儒家治国思想的认同	(36)
三 对中国传统习俗的认同	(49)
第二章 拓跋鲜卑及其政权的“中国”认同	(57)
一 拓跋鲜卑的民族认同	(58)
二 拓跋鲜卑的文化认同	(66)
三 拓跋鲜卑的政治认同	(74)
第三章 契丹与辽人的“中国”认同	(89)
一 自称“炎黄子孙”	(89)
二 袭用“中原即中国”、“九州即中国”的理念,自称“中国”	(99)
三 袭用佛经“南赡部洲”之说,自称“中国”	(102)
四 袭用“懂礼即中国”的思想观念,自称“中国”	(105)
五 自称“北朝”	(109)

六 认同中国传统文化	(124)
七 公开标榜自己是“中国”	(125)
八 自称中国“正统”	(129)
九 辽人自称“中国”也承认宋朝是“中国”	(133)
第四章 女真与金人的“中国”认同	(136)
一 金人自称“中国”	(136)
二 金人自称“正统”	(148)
三 金人自称“中国”,也承认宋朝是“中国”	(165)
第五章 蒙古族及其政权的“中国”认同	(174)
一 蒙元时期蒙古族的“中国”认同	(174)
二 明清时期蒙古族的“中国”认同	(197)
第六章 满族与清人的“中国”认同	(209)
一 满族与清人对“炎黄”等先祖的认同	(209)
二 清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216)
三 清人自称“中国”	(223)
四 清朝自称“中国正统”	(226)
结 语	(229)
参考文献	(233)
后 记	(259)

绪 论

《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是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主要对中国古代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慕容鲜卑、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的“中国”认同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这一认识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仍有人心存疑问，谓在这一“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中为何有的民族一直没有脱离“一体”，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之中，而有的民族则脱离了“一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我们以为，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一点是由于这些民族是否存有“中国”认同意识以及这种认同意识出现发展变化所引起的。有的民族一直存有“中国”认同意识，最终融入中华民族之中，有的民族最初也存有“中国”认同意识，但后来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脱离“一体”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现象。毫无疑问，“中国”认同意识，在中华民族凝聚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中国”认同概念的界定

我们所说的“中国”认同意识，内涵比较丰富，用一句话两句话很难说清楚。因此，我们还要从中国古代“中国”一词的涵义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通过有关史料爬梳，我们认为中国古代“中国”一词的涵义很多，但主要的则有以下几种。

第一，古代“中国”的第一个涵义，是用来指称一国的中心，即“中央”“中央之城”“都城”“京师”“国中”“王畿”的意思。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说尧死后，舜在“中国”这个地方继承了天子之位。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刘熙的话对这句话解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就是说，这时“中国”的含义是指一国之中心的都城。《毛诗·大雅·民

劳》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说“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中国”与“京师”对举，表明其涵义相同，故尔毛传解释说“中国，京师也”。《孟子·公孙丑下》记载“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①，意思是说“王欲于国中央为孟子筑室”^②，说明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国家的中央，也就是国家的中心地区“国中”的意思。《春秋穀梁传》昭公三十年也记载说：“公在乾侯，中国不存公”，是说季孙氏不让鲁昭公在中国存身。晋范宁《集解》对这句话解释说：“中国，犹国中也”^③，也认为此“中国”是“国中”的意思。春秋战国以后，中国的含义不断发展变化，但作为“京师”“中央”“国中”这一含义仍时而被人们使用。如，《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咸则三壤，成赋中国”，颜师古注曰：“言皆随其土田上中下三品，而成其赋于中国也。中国，京师也。”按颜师古的解释，这里的“中国”也是指京师。《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颜师古解释说“中国谓京师”，说明这里的中国也是指京师。陈连开曾指出“直到清朝，此义一直在沿用”^④。

第二，古代“中国”的第二个涵义，是用来指称中原，引申为中原王朝，主要的是一个地域概念。西周以前，“中国”一词多指一国之中心，到了春秋战国以后，“中国”一词已经由一国之中心引申为天下之中心。如，《战国策》说“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⑤，明确赋予中国以天下中心之义。《扬子法言·问道》说“中于天地者为中国”^⑥，《盐铁论·轻重》说：“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⑦，也赋予中国以天下中心之义。宋人石介也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⑧，将“中国”视为天下中心之义说得更加明白。由于受时代和条件的限制，古人以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就是天下的中心地区，因此称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为“中国”。如，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宋、郑等看成是中国，而将中原以外的秦、楚、吴、越看成是夷狄，不是中国。如，楚国国王熊渠自己就承认

① 《孟子》卷4《公孙丑下》，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

② 《孟子》卷4《公孙丑下》赵岐注，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春秋穀梁传》卷10，昭公三十年正月，范宁集解，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刘向：《战国策》卷5《秦策三》，张清常、王廷栋签注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⑥ 扬雄：《扬子法言》卷4《问道》，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 《盐铁论》卷3《轻重第十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⑧ 石介：《中国论》，《徂徕集》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①，《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吴太伯世家》说，“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认为秦、楚、吴、越是夷狄，不是中国。后来各朝均以中原及其中原政权为中国。所使用“中国”一词的涵义主要的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并由此引申为中原地区所建立的政权及其所控制的区域。杜荣坤曾指出，历史上“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②，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古代的“中国”一词的第三个涵义，是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引申为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是用民族作为划分“中国”的标准。如，孔颖达为《尚书》“华夏”一语作疏曰：“华夏，谓中国也”^③。《春秋左传》记载“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晋杜预作注曰“诸夏，中国也”^④。《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何晏引包氏之文解释说：“诸夏，中国”^⑤，都认为华夏即是“中国”。此外，《诗·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礼记·中庸》：“足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王制》称“中国、夷、蛮、戎、狄”为“五方之民”，等等。都以“中国”与“蛮貊”、“四夷”对举，显然是以“中国”指华夏族，并引申为华夏族建立的政权，而以蛮貊、夷狄等指称四夷等少数民族，并引申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华夏族发展为汉族，汉族及汉族建立的政权又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⑥；元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说：“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儿、汉人之类，皆习故而言”，又说“鲜卑谓中国人为汉”，又称“汉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汉人，犹汉时匈奴谓汉人为秦人也”，又在为契丹“朝廷制度，并用汉礼”作注时说“北方谓中国为汉”^⑦。孙祚民认为“可以以‘汉族’或‘王朝’来‘代替中国’”^⑧，就是

① 司马迁：《史记》卷40《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92页。

② 杜荣坤：《试论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尚书》卷11《周书·武成》，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85页。

④ 《春秋左传》卷11，闵公元年，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786页。

⑤ 《论语注疏》卷3《八佾》，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466页。

⑥ 朱彧：《萍洲可谈》卷2，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第25页。

⑦ 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22第739页、卷167第5180页、卷202第6391页、卷285第9325页。

⑧ 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

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问题的。

第四,古代“中国”一词的第四个涵义,是在天下中心的基础上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孔颖达为《尚书》“华夏”一语作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正义曰:“冕服采章对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①。孔颖达又为《春秋左传》作疏曰,华夏“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②。元吴澄也曾解释说:“夏犹四时之夏,明而大也,中国文明之地,故曰华夏”^③。华夏即是中国,于是中国又被赋予华丽、光华、光明、文明、高贵等含义。《礼记·王制篇》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④认为,中国与夷、蛮、戎、狄四夷由于生活方式不同,存在着文化差异。战国时赵公子成说:“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⑤汉朝侯应说:“中国有礼仪之教,刑罚之诛。”^⑥认为,“中国”文化水平最高,懂文明,知礼义,有教养,最为高贵。古人认为,中国与四夷的文化差异最突出的表现是是否懂“礼”,所行合乎“礼”的要求即是“中国”,不符合“礼”的要求即是夷狄,赋予中国以超越种族的文明含义。春秋时期南方的吴国,虽是西周正统姬姓周太王及其后人所建,但由于他们没有奉行“中国”之礼,也不是中国。“礼”的标准高于族类的区别,昭示出“中国”和“夷狄”并非完全是种族概念,而是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文化概念。孔子十分注意以“礼”区分中国和四夷,并认为中国和四夷可以互相转变。韩愈在概括孔子这一思想时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⑦也就是说,不管你原来的种族如何,只要遵循中国(中原)之礼就是中国华夏,遵循夷礼就是夷狄。这种用“礼”来区分中国和夷狄以及中国和夷狄可以互相变化的思想,为后来许多思想家所接受。汉代董仲舒就曾指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

① 《尚书》卷11《周书·武成》,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85页。

② 《春秋左传》卷11,闵公元年,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786页。

③ 吴澄:《书纂言》卷1《虞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礼记》卷12《王制》,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338页。

⑤ 刘向:《战国策》卷19《赵策二》,张清常、王廷栋签注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⑥ 班固:《汉书》卷94下《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4页。

⑦ 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11《原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为君子”^①；唐朝的皇甫湜也说：“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②，北宋程颢和程颐也说过，中国“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③，赋予中国和夷狄以文明与野蛮、尊贵与卑贱之意，文化的意义大于种族意义。冯友兰先生曾指出，“中国”一词在古代文化意义上最甚，民族意义较少，国体意义尚无^④，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五，中国古代“中国”一词虽然主要的不是用来指称政权，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也就是说，“中国”一词也是政权的名称。

有人依据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政权用“中国”作国号而否定“中国”是政权的名称。中国古代各个政权虽然没有用“中国”作国号，但常常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一词用来指称政权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一种是他称。

中国古代，华夏和汉族虽然都没有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政权，但他们大多自称“中国”，这已经成为大家所熟知的事情，自然不用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积极地认同于中原政权及其华夏和汉族政权，常常以华夏、汉族政权的继承者自居，也自称“中国”。如：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人承认司马迁关于“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⑤的说法，以“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⑥，“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甥”^⑦。因此，匈奴人刘渊在建立政权之时，拒绝了其叔父刘宣恢复“匈奴”国号的建议，特定国号为“汉”，声称“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⑧，就是以汉高祖刘邦的传人自居，要继承两汉之统、光大两汉之业。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政权之时，也“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定国号为“大夏”，目的是要“复大禹之业”^⑨。巴氏李寿定国号为“汉”（即成汉），定年号为“汉兴”，也是为了“与刘备的汉乃至刘邦的汉攀上关系”^⑩。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据赵旧都”^⑪，是以战国时期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2《竹林第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2《论序·东晋元魏帝正闰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2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页。

⑥ 房玄龄等：《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45页。

⑦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5《魏纪七》，嘉平三年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⑧ 房玄龄等：《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49页。

⑨ 房玄龄等：《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02、3205页。

⑩ 胡阿祥：《中国历史上的汉国号》，《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5期。

⑪ 房玄龄等：《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21页。

华夏人建立的赵国为继承对象,自视为“中国帝王”^①。慕容鲜卑建立燕国也是“远遵周室,近准汉初”^②,即以周初封召公奭于燕建立燕国和汉初封卢绾于燕重建燕国为继承对象。氐人苻坚建立的前秦、羌人姚苻建立的后秦、鲜卑人乞伏国仁建立的西秦,则是以秦为继承对象。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人建立以“魏”为国号的北魏政权,是因为“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是为了远承战国时期华夏人建立的魏国和近承三国时期汉人建立的曹魏,意欲与晋争夺中华正统^③。宇文鲜卑建立的周(北周),则是意欲绍述华夏人建立的西周和东周而选择的国号。五代十国时期的沙陀人李克用建立的后唐,是以汉人建立的唐朝为继承对象。沙陀人石敬瑭建立后晋,亦寓继承先秦时期华夏人建立的晋国以及汉人建立的西晋、东晋之意。沙陀人刘知远“居于太原,及得中国,自以姓刘,遂言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昺之后,国号曰汉”^④。沙陀人刘崇仍定国号为“汉”(史称北汉),是“以高祖之业一朝坠地”^⑤,欲绍袭高祖之业,也以继承汉人建立的两汉之业而自居。宋辽金时期,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用契丹文字称自己建立政权的国号为“大中央契丹辽国”或“大中央辽契丹国”,也是自称中国之意^⑥。辽道宗时期,刘辉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挽抚”^⑦,所说“中国”,就是指契丹。金人也自称“中国”,《金史·完颜纲传》记载,依附于宋朝的吐蕃族系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⑧,所说的“中国”就是指金朝。此外,党项族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女真族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等等,也都是袭用华夏、汉族政权的国号,也寓有继承华夏、汉族政权之意,说明他们建立政权之初就以华夏、汉族政权的继承者自居,视自己的政权为中国。元、明、清三朝之中有两个朝代(元、清)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也都自称“中国”。

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的他称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几个政权并

① 房玄龄等:《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石弘》,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53页。

② 房玄龄等:《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10页。

③ 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6《后汉纪一》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⑤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0《后周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454页。

⑥ 辽朝的国号,有时称辽,有时称契丹。据刘凤翥先生研究,在汉字文献称国号为契丹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中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契丹辽国”,在汉字文献称国号为辽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中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辽契丹国”,刘凤翥认为,“大中央契丹辽国”和“大中央辽契丹国”中的“中央”也可视为国号“中国”的“中”。(参见刘凤翥《从契丹文字的解读探讨辽代中晚期的国号》,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⑦ 脱脱等:《辽史》卷104《刘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55页。

⑧ 脱脱等:《金史》卷98《完颜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5页。

立之时,地处中原之外的政权常常依据中原即中国的地理观念称占据中原地区的政权为“中国”,或依据华夏汉人为“中国”的理念称华夏汉人建立的政权为“中国”,这也是人们所熟知的事情,毋庸论述。

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他称的第二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对以前某一个政权的称呼或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①。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之时,因为所涉及的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众多,难以一一列举且无法用某一个“国号”代替时,就用大家都愿意接受的“中国”一词统而贯之,这样称呼以前连绵不断的各个政权既方便简捷又符合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均自称“中国”的事实,因而成为中国古代“中国”一词指称政权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一词用来指称政权时,主要的是后来政权对前朝的称呼,即“继承性中国”的概念。众所周知,夏朝和商朝并没有自称“中国”^②西周出现的“中国”一词也主要是指“京师”,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但后来的各个朝代皆以夏、商、周三代为典型的“中国”,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中国圣人,并无疑义。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韩、赵、魏)、宋、郑等政权被视为“中国”,秦、楚、吴、越等政权则被看成是夷狄,不是“中国”。即使到了秦统一以后,有人说秦是夷狄,不是“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政权并没有将秦、楚、吴、越排除到“中国”之外,均承认秦是“中国”,常常“谓中国人为秦人”^③。三国时期,吴、蜀二国虽然没

① 姚大力认为在中国古代存在一个“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历时性的“中国”(《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见《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姚氏提出“历时性中国”的概念,无疑是一具有远见卓识的认识,但这一“历时”,是指中原政权的“历时”,还是指汉族政权的“历时”,还是指人们争论不休的“正统王朝”的历时,实在难以确指。因此,笔者提出“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的“继承性中国”的概念,似乎能稍微具体一些(参见赵永春《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赵永春、贾淑荣《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② 也有人认为,商也称中商,“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见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版;田倩君也认为商称大邑商就是称“中国”之意,“准此,‘中国’称谓的起源定然是从商代开始的”(《“中国”与“华夏”称谓之寻原》,台湾《大陆杂志》1966年第31卷第1期)。然商朝毕竟没有出现“中国”一词,不能作为商朝始称“中国”之依据。

③ 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下》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3页。

有自称“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政权在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时，都承认三国是“中国”，并没有疑义^①。东晋十六国时期，晋人不承认北方的十六国为“中国”，后人有人不承认十六国为“中国”，但也有人承认十六国与古之列国相同，如司马光就曾在他所撰写的《资治通鉴》中说：“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以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②反对称十六国等政权为僭伪政权，认为这些政权与古之列国无异，就是承认这些政权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虽然南朝不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后来的政权均承认北朝是“中国”，如隋朝曾按五德终始学说确定自己政权的德运为“火”德，就是承继北周“木”德而来，说明隋朝是以承继北朝自居，承认北朝为中国正统的地位。唐朝李延寿将南北朝历史改写成《南史》和《北史》，则是对隋唐所继承的南北朝各个政权都是中国的承认。后来，《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均被列入中国历史“正史”系列，也是后来政权对北朝是“中国”的承认。五代十国时期，十国虽然没有自称“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政权都说十国是“中国”。宋辽金时期，虽然有人不承认辽、金是“中国”，但元人分别撰写《辽史》、《宋史》和《金史》，“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③，就是对辽、金也是“中国”正统的承认。后来各个王朝均将辽、宋、金三史列入中国历史的“正史”系列，也是对辽、宋、金都是中国的承认。元朝时期，虽然有人仍然抱着汉族和汉族政权是“中国”的观念不放，不承认元朝是中国，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但后人多承认元朝是“中国”，明人所修《元史》以及近人所修《新元史》被列入中国历史正史“二十四史”和“二十五史”系列就是最好的证明。明太祖朱元璋最初试图不承认辽金元是中国，后来转变认识，也承认辽金元是中国。他曾对高丽说：“凡所交往，此以诚交，彼以诈合。将以罢交，彼又卑辞，若此之为，朕不知其何心？且朕观累朝征伐高丽者，汉伐四次，为其数寇边境，故灭之。魏伐二次，为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故屠其所都。晋伐一次，为其侮慢无礼，故焚其宫室，俘男女五万口奴之。隋伐二次，为其寇辽西阙蕃礼，故讨降之。唐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兄弟争立，故平其地置为九都督府。辽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反复寇乱，故焚其宫室，斩乱臣康兆等数万人。金伐一次，为其杀

① 后人对三国何为正统问题争议较大，有人主张以魏国为正统，有人主张以蜀汉为正统，他们所说的正统都是指中国正统，非正统也是指中国的非正统，正统和非正统都是中国。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9，黄初二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87页。

③ 权衡撰，任崇岳签证：《庚申外史签证》卷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使臣,故屠其民。元伐五次,为其纳遁逃、杀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兴师往讨,其王窜耽罗捕杀之。原其衅端皆高丽自取之也,非中国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者也。”^①明确地将辽金元帝王视为“中国帝王”,无疑也是对辽金元是中国的承认。清朝时期,也曾有人不承认清朝是中国,但后人都承认清朝是中国,后人编写的《清史稿》被列入中国历史正史“二十五史”和“二十六史”系列以及中华民国以清朝继承者自居改国号为“中国”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的他称的第三种情况,是当时和后来的“域外”政权对中国历史上某一政权或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各个政权的通称。据胡阿祥先生研究,“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其中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除了汉、唐、中国、中华这些源于国号、名号的称谓外,还另有支那(China,或译真丹、震旦等)、赛里斯(Serice,或译舍里斯、赛里丝等)、桃花石(Taugas,或译陶格司、汤姆格岌等)、契丹(Cathay,或译乞塔、契泰、迦太等)四个系列”^②。在这四个系列当中,除赛里斯系列以外,其余三个系列都与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有关。如:欧洲多称中国为China或Cina,一般认为,Cina又译作脂那、至那、支那、震旦等。早在1655年,传教士卫匡国就提出China和“支那”是“秦”字的音译的观点^③,为后来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如,姚从吾先生就曾指出:“西欧各国和美国,称我国为China,即是出自‘支那’的。推究由来,可能是‘秦’(Sinos, Ghina - Thin)字的转译”^④,认为China是“支那”的音译,“支那”又是“秦”的音译。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的话,“China”或“支那”就都和中国历史上的“秦”攀上了关系,也就是说,域外称“中国”为“China”或“支那”,就是称“中国”为“秦”,这里所说的“秦”毫无疑问就是指中国历史上的“秦朝”。中国历史上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统一的“秦朝”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发展而来,而春秋战国时期秦的前身则是由西戎发展而来,最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春秋战国时期还不被中原各国看成是“中国”,到了秦朝统一以后才被公认为“中国”了。刘镇清也认为英语中“China”一词是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秦国国名“秦”,认为“秦”和“秦国”两词首先进入波斯语成为“Chin”和“Chinistan”,再经波斯语进入梵语成为“Cina”和

① 郑麟趾:《高丽史》卷137《辛禡传》,平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1958年版。

② 胡阿祥:《中国古今称谓探微》,《中国地名》2003年第5期。

③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④ 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从契丹汉化看国史上东北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合流》,《大陆杂志》第4卷第4期,1952年。

“Chinasthana”,最后经梵语进入英语成为“China”。^①可见,外国称中国为“秦”,并没有将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排除在中国之外。再如,自公元7世纪直至13-14世纪,欧洲、阿拉伯、突厥、回鹘等文献中,大量地出现“Taugas、Tamghac、Tabghaq、Tavghaq”等词,这些词的汉语译音都是“桃花石”,一般认为是指中国。在宋人笔记和元人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说域外一些国家以及西北的一些少数民族称中国为“桃花石”。关于桃花石的语源和语义,人们认识不一,主要有“大魏”“唐家”“大贺氏”“拓跋”“天子”“敦煌或太岳”“大汗”“大汉”等多种说法。法国学者伯希和最早提出桃花石是元魏拓跋译名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等人均同意此说,中国学者也多持此论,认为桃花石为拓跋的对音^②。“拓跋”即为中国历史上的拓跋鲜卑,曾建立北魏政权,常被人们称为大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如果将“桃花石”一语说成是拓跋对音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些域外民族和国家实际上是用拓跋鲜卑或拓跋鲜卑建立的魏政权来称“中国”了。此外,历史上,“大陆邻邦,如俄罗斯、波斯(伊朗)等国,称我国为Ki-tan或Ki-tai”,至今俄语称中国之词仍为“Китай”。姚从吾先生认为,这些词“确是导源于第十第十一世纪建立辽朝的契丹,或西辽(喀喇契丹)”。又说,“蒙古文中‘中国’与‘乞塔’有时不分,更与‘契丹’有关。至于英文德文China以外,在诗歌或书名中,有时也称我国叫Cathay或Kathay,它的意思是指‘古代北中国’,自然也是契丹的转译”^③。刘镇清也认为,“英语中Cathay一词源于我国北方契丹国(辽)的国名‘契丹(Khyattan)’。认为Khyattan入突厥语成为Khitay,经阿拉伯语的Khyattan而入拉丁语为Cathaya,最后由拉丁语进入英语”^④。俄语Китай,是“契丹”的音译,学界似乎没有疑义。毫无疑问,契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曾建立强大的辽政权,辽政权走向衰亡之际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又建立了西辽政权,也称“喀喇契丹”或“哈喇契丹”。辽和西辽都是由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契丹族为统治者建立的政权,俄罗斯等国称“中国”为“契丹”,无疑是承认契丹和哈喇契丹都属于中国。从上述域外政权对中国的他称来看,中国历史上的“中国”也与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有着不解之缘,说明外国不但没有仅仅认为华夏和汉族建立

① 刘镇清:《China和Cathay词源新探》,《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② 阿地力、孟楠:《百年来关于“桃花石”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2期。

③ 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从契丹汉化看国史上东北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合流》,《大陆杂志》第4卷第4期,1952年。

④ 刘镇清:《China和Cathay词源新探》,《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的政权是中国,反而认为西戎建立的秦、拓跋鲜卑建立的魏、契丹建立的辽是“中国”的代表,并用这些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称谓来统称中国。说明这些少数民族作为中国的代表,并不逊于以华夏和汉族及其建立的政权来代表中国,相反,倒比华夏、汉族及其所建政权在代表中国方面有着更加广泛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的多种涵义之中,后来的“中国”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各个政权的通称比较切合实际。因此,我们认识历史上的“中国”,也应该采取历史上后来政权称以前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各个政权为“中国”的思路,去追述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

由于历史上“中国”一词的涵义众多,因此本课题所说的“中国”认同也包含多种涵义,既有用“中国”一词指称华夏汉族以及“炎黄子孙”的民族认同的涵义,也有用“中国”一词指称中原的中原(中国)认同的涵义;既有用“中国”一词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认同的涵义,又有用“中国”一词指称历史上某一政权或指称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各个政权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历史认同的涵义。各个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直接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则是这一认同的最高表现形式。

二 本课题研究意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些人极力主张强化“华夷之辨”,强调“夷夏大防”,他们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①,“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②,“性气贪婪,凶悍不仁”,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戎晋不杂,并得其所”,“华夷异处,戎夏区别”^③,反对民族杂处。这种强调“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的思想,容易激发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加民族隔阂、矛盾,以致出现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利于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融合,更不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也有人认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在于是否强化“华夷之辨”和“夷夏大防”,而在于国力的强盛,也就是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主要是靠武力控制少数民族的结果。应该说,依靠武力是促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仅靠武力控制难服“夷狄”之心,一旦出现中原政权势力衰弱的形势,

① 《春秋左传》卷26,成公四年,北京: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901页。

② 班固:《汉书》卷94《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34页。

③ 房玄龄等:《晋书》卷56《江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29页。